《专题：徐定超研究》编者按 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人提倡事功，谋划富国强兵之策，成为南宋中期最有影响的三大学派之一。晚清面临内忧外患局势，以孙衣言为代表的温州学者群体继往开来，身体力行，弘扬事功之学说。徐定超任京畿道监察御史、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提调总教习期间，深入研究外交、内务、军事、财政、医学，奏请清廷决策，名满京畿；他昌明先哲学统，传承于后进而影响无穷，使后世言浙学中兴之功咸推源于徐定超；他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建立浙江国民尚武会并任会长；他谋划光复杭州，出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周旋于新旧势力之间，稳定浙江局势，救济温处灾民，为浙江新民主革命奠定人才基础。乡谚称："温州出班侯，百姓不用愁。"后经国民政府批准，在江心屿建立功德塔和徐公祠，成为一座温州近代史丰碑。温州大学孙诒让研究所主持徐定超研究专题，从政治、经济、教育、医学等方面研究徐定超的事功实践，阐释徐定超与历代名臣相媲美之缘由。希望有更多的学者研究徐定超，以更好弘扬温州学人之丰功伟绩。

DOI: 10.13669/j.cnki.33-1276/z.2022.019

徐定超教育观探析

陈　林，王兴文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维新运动后，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深入，徐定超的教育观念虽仍未脱离"中体西用"的范畴，但有所深化。教育观方面，他尤其重视医学教育与蒙学堂教育；医学教育方面，他主张对中西医分而教之，以便精专；蒙学堂教育方面，他主张以中学为内容，为学生奠定根基。徐定超还提倡开设华侨学堂，传承中华文化。这些教育观念对今日之教育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徐定超；教育观；中体西用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326(2022)02-0001-06

An Analysis of Xu Dingchao's Educational View

CHEN Lin, WANG Xingwe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Abstract: After the Movement of Reform, Xu Dingchao's educational view has been deepened with the deepening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even though it has not departed from the category of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view, Xu Dingchao attached special importance to medical education and enlightment education; regarding medical education, he advocated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hould be taught separately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specialization; as for enlightment education, he propose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Moreover, he even advo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to inherit Chinese culture. These educational views still ha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urrent education.

Key words: Xu Dingchao; educational view;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徐定超（1845—1918），字班侯，人称班老、班公、永嘉先生，永嘉县枫林人。光绪二年（1876年），中举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及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提调总教习。

［收稿日期］2022-03-27
［作者简介］陈　林（1995— ），女，山西孝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温州地方史研究；
王兴文（1964— ），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科技经济史及温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管理局大臣陆润庠聘其为施医局司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薪俸积蓄托其侄象严在家乡枫林兴办楠溪高等小学。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浙江巡抚增韫上《请以徐定超接充两浙师范学堂监督片》，聘任徐定超为监督；十月，呈请浙江巡抚增韫批准，在杭州设立浙江病院。辛亥革命后，出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民国二年（1913年）5月，任旧温属护商警察局长。民国四年（1915年）春，担任浙江通志局提调。民国七年（1918年）1月，劝说军界人士放弃战事；1月5日凌晨，因普济轮事故遇难。

近年来，随着学界研究视角的开拓，徐定超逐渐进入学人视野。目前，学界对徐定超的研究已经有一定成果，如《徐定超与浙南革命群体》《监察御史徐定超》等，这些成果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其社会实践层面，如教育实践、医学实践等。但是，目前学界对徐定超的思想观念研究甚少，因此笔者以《徐定超集》为核心史料来探究徐定超的教育观，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徐定超。但由于辛亥革命后所存资料不足，故本文研究时段主要为清末。

一、徐定超教育观形成背景

1.徐定超生存之下的文化环境

1840年，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在思想上寻求向西方学习的合理依据。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文化的先进与否来划分夷夏，他认为西人“……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1]。魏源将西人视为通今博古、技艺精湛的“良友”。但同时他也主张“制夷”，强调华夏的民族认同，这是“夷夏之辨”封闭性的一面。[2]56除魏源外，大理寺少卿金应鳞等人也从“夷夏之辨”的角度，论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

同时，“夷夏之辨”也成为反对向西方学习的理论依据。如梁廷枏认为：“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虽然，服之而已矣，何必胜。”[3]在梁廷枏看来，西方的先进事物，其根源皆在中国，如今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是用夷变夏，本末倒置，其核心思想为“西学中源”。

总之，鸦片战争时期的先进人士，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片面性，他们认为华夏文化较西方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此外，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人，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故步自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师夷长技”已成为有识者的共识，并且地方势力派在此基础上发起了洋务运动，各地开设工厂、兴办各式学堂，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对于守旧者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新旧之争随之而起。

同治五年（1866），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大学士倭仁反对道：“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虑及之者”，“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4]30。倭仁认为西人教习事关重大，中国人才济济，必不乏精通天文算术者，中国不必以夷人为师。其核心思想即是夷不如夏，不必师夷。光绪元年（1875年），通政使于凌辰批驳李鸿章、丁日昌筹议海防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导之以甚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仪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势也”。[5]守旧者对于变法持否定态度，“他们一条线划断夷夏，撇开夷夏文化的优劣不论，仅从族类上的夏尊夷卑、政治上的夷夏敌对入手否定学习西方。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排外便成了盲目排外”[2]57。

面对守旧者的诘难，洋务派不得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向西方学习的合理依据。“西学中源”说即被洋务派用来缓和守旧者对于西学的抵制。总理事务衙门大臣奕䜣谈道：“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亦臆说也。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4]24 此外，洋务派也有自己新的观点，即中体西用观。这一时期把洋务宗旨阐述得最完整、最透彻的是冯桂芬。其在所著的《校邠庐抗议》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他的洋务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指导思想，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纲领，也成为后来“中体西用”的滥觞。

总之，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向西方学习的合理依据。但此时夷夏观念并没有完全消除。如在面对西方基督教对华夏名教的威胁时，王韬谈道：“瀚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

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当清王朝在中外通商中获利时，他又谈道：“夫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目前以为甚便，而后蒙其祸者，当时以为无伤，而久承其弊者，如今西人之互市于中国是也。”[6] 他对中西交融的现状深感忧虑，在其内心深处依然坚持“夷夏大防”的观念。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对西方的学习上升到了“制度”层面，中体西用论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甲午战前，中体西用论多解释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等。但到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重新评估了中西学的地位，康有为提出中学和西学“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两者缺一不可，应当置于平等的地位[7]294，并且他还提出对待中西文化应“泯其界限，化其门户”，两者互补互通，才能真正实现变法自强。严复认为体用“即一物而言”，二者统属于同一事物，且不可分割，其以牛体不能为马用的观点，批驳了如同非牛非马理论的“中体西用”说，且指出“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8]。部分维新派人士则认为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中体西用”文化观，阻碍了维新变法，“‘中体西用’已经不再是领导社会革新的新思潮，而是变成一道阻挡汹涌的维新大潮的拦河坝”[9]。尽管这一时期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总体来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群体，并没有完全脱离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框架，康有为把儒教定为国教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康有为也明确提出：“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他主张学习中西各种学问，“皆以孔子经学为本”[7]172。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指出：“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10]表面上梁启超论述了中西学的平等地位，但其中仍然蕴含着中学为本的观念。

“‘中体西用’不仅是洋务派的纲领，更是一代人的思想和社会思潮。”[11] 徐定超与康梁等人同属一个时代，他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难以从完全平等的视角看待中学与西学。但是，维新运动以来的文化环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观念，因此至维新时期，徐定超对变革的自我认知已较前期的中体西用观有所进步。

2.对近代化潮流的自我认知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一批有识之士痛定思痛，从思想到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努力寻找救国道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梁宣导变法，同僚多目为狂妄。谱主以为国家改革殷周尚矣，惟积弊太深，操之过急，必生变端，反为不利”。[12] 徐定超认为改革应效法古史，并且他主张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在此种认知之下，徐定超在政治、教育、医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尤其在教育方面，徐定超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担任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提调教习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西医教学的不同见解。同时，他编写了《伤寒论讲义》作为医学馆的教材。

徐定超在任教的同时，亦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徐定超为楠溪高等学堂捐资银元一百，以支持家乡办学，他还规劝家乡子弟入校肄业，图谋普及教育，为国培育人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2月，徐定超撰《楠溪高等学堂碑记》，他指出：“欧美各洲强大之邦，出其所学以治其国，百废俱举，而中学反若逊之者。非学逊之也，人亡而学弊，学弊而政息，徒文不足以自强也。”[13]121 徐定超认为，中学并不逊色于西学，其关键在于求学的热情。近代中国的衰落皆是因为人们对教育的忽视，教育不兴导致国家衰落，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他还批评了当时学习中西的弊端，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执中者排外，弃旧者褒新，入主出奴，黑白混淆，莫衷一是。其尤甚者，则又肆言无忌，创为异说，以惑膠庠，盖亦不知学之甚矣！”[13]121。他认为学习中西者，或是保守排外，或是完全西化，他们将中学与西学对立起来，并试图以其中一方否定另一方。针对这些问题，徐定超提出了一些建议：“圣天子兴教劝学，自视欿然，乃诏天下大兴学校，集中西之学以学之，而设学务大臣于京师，以察其事而督其成，天下靡然从风，渐知取诸人以为学矣。学知取诸人，则不患不足矣。虽然，学无常师，主善为师，无人无我，惟其善而已。”[13]121

徐定超提倡兴教劝学，融合中西，并主张在京师设学务大臣以为监督，以期上行下效，使得整个社会形成“学无常师”与“主善为师”的风气。在他宣导下，乡里众士庶出资者多至数百家，集资三千余元，对志仁书院进行彻底改造，最终使其成为一所新式高等小学。他对捐资助学者往往予以赞扬，如蓬溪吉生之子捐助六百元，他在《吉生先生家传》一文结尾赞曰：“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其是之谓与?”

总的来说，徐定超主张变法要融合中西，他不

仅强调取法西学，而且也提倡保留国粹。这些主张不仅体现在他的教育事业中，在其他方面亦是如此。如在《更定官制办法十条折》中徐定超指出："一曰专责成。……无事可办人员亦宜使之多读政治之书，如历朝圣训、《六部则例》、《经世文编》及近日时务新书之类，均宜浏览一遍，粗明大略，再择精要，默识于心，至其专职，犹宜深考详求，储以待用。"[13]3在更定官制奏折中，徐定超认为官员应该博览群书，贯通中西。

尽管徐定超对于近代化潮流有着一定的先进认知，但是其身在仕途，言行举止逐渐受到官场习气浸染，这难免影响了其在新学阵营中的个人形象。1909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发生了反对旧礼教、旧文化的斗争，学堂监督夏震武因推崇封建文化，推行"庭参"礼节而遭到全体教师反对，最终学堂监督一职由徐定超接任。"据吴克刚《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一文中回忆，徐班侯到校后所出布告都写明'京畿道监察御史兼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徐定超署'，官气是十足的。"[14]"木瓜之役"结束后，鲁迅离开杭州回到绍兴，杨莘耜亲赴绍兴邀请鲁迅回校任教，鲁迅与其谈道："徐班侯该佬倌也不好弄的，你要当心点。"[14]徐定超为官数十载，其行事带有浓厚的官僚习气，这并不为新学者所喜，因此徐定超并未获得鲁迅等新学者的完全认可，其推行之新学也难以获得这些人的支持。

二、徐定超教育观的内容

1.重视中西医教育，建议分而教之

（1）编纂《伤寒论讲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徐定超被聘为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提调教习，在任期间，徐定超授《内经》编《伤寒论讲义》。在讲义自序中，他陈述了自己钻研医学的原因，"定超少多病，喜阅方书，迄无所得。壬辰春，病下痢赤白，一药而愈。嗣以食复履发，延至癸巳秋间，病重幾殆，一老妪与以汗药数丸而痊，乃知此事之无穷。遂发愤求之于古，稍稍能通其扃钥而得其肯綮"[13]189。徐定超从自身经历中感知到医学的精深，此后他立志钻研此事，医术逐日精进。在其担任总教习时，编纂教学讲义为其传播医学知识提供了一个契机，他将自己所知所学都集于这本讲义中，以求"六经脉证之剖析、传变无穷之病情，盖已昭示而靡遗矣……上以推两宫痌瘝在抱之仁，下以救百姓床褥呻吟之厄，医道之复明可指日而待也"[13]190。徐定超钻研医学的初心是以医济人，为上分忧，为下解疾苦。此外，徐定超把习医同振兴中华联系在一起。在自序开篇即大声疾呼："医道之不明久矣。欲振兴而昌明之，其必由学乎?"[13]188进而他又谈道："医以卫生命、起沉疴，自天子王侯以下，一遇疾病，无不惟一是赖。故欧美各国之医士精心研究，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期于穷极性命之微而后已。日本之人亦兼采中西，蒸蒸日上。今之论日本者，至以此事为强国之始基，何其盛也。"[13]188徐定超不仅将医学视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依赖，还将其视为国家振兴的根基。在其看来，日本医学融合中西，不断精进，这为日本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因此，徐定超希望国人可以融合中西医术，通过习医而振兴中华。刘绍宽曾评价这本讲义："其书又名《内科伤寒论讲义》，以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蓝本》，遵《内经》之旨阐述《伤寒论》，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参考二十余家，内容中规中矩，切合临床，符合教学之用，原为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教材。其一二独出心裁之处，有所发挥……均为经验之谈，颇为可取。"[15]刘绍宽指出，徐定超所编的这本讲义，极具实践意义，并且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除了《伤寒论》讲义外，徐定超还编著《灵枢》、《素问》等各种教材，行之于世，京都众多中西医士深为叹服。

（2）上《中西医派不同宜分办学堂折》。《中西医派不同宜分办学堂折》开篇即写道："东西洋强盛之邦，无不视医为重要，不论都会、乡镇，遍设医学堂、施医局，凡以全民命而共登之仁寿之域者也。"[13]8徐定超强调了医学发达乃是国家强盛的重要表象。徐定超在大学堂任医学馆教员期间，虚心向中西医士学习，"朝夕从事，备与中西各医士讨论医理，经理医事。敢将历年经验甘苦，知医派确有不同，造士不能合并之由"[13]9。在多年的医学实践中，徐定超领会到了中西医的区别，因而提出了分而教之的方案。徐定超认为中西医皆各有其特点，他在奏折中徐定超讲道："夫中国之医，始于《灵》、《素》，而发明于张机、孙思邈诸大家，所以推阐脏腑经络之理，与夫六气七情之足以病人，草木金石诸药之足以疗病者，几于无美不备。西医则自希腊海普瑞滥觞于先，英之质那尔、法之琶司夺、德之廓荷数人阐明于后，其剖解之工，疡科之效，器具之精良，全体之完备，亦足令人殚精竭虑、穷年累月而不可遽希。"[13]9

中医理论认为"六气七情"足以让人生病，但草木金石等各种药物也足以治疗病人；而西医则注重手术，此须器具精良，人员完备，这难以在短期内有

所成效。他总结道："大致中医多理想，西医凭实验，中医重述古，西医贵求新，其诣力独到之处，各有不少思议之精微。"[13]9进而他又指出："学者各专一门，已苦难于精到，必欲兼营并骛，心力更有未遑。"[13]9学医者各专一门，已是困难重重，如今中西医兼而学之，必定难以做到。徐定超建议："……博而不精，不如专而得要。中医于各医内独树正宗，而尤切于实用，宜专授列代名医方药，以溥皇仁，宜附属医局，由知医管理大臣督率筹款经办。西医于中医外别开蹊径，而亦有益民生，宜延聘各国良医，广购历年经验医方圆说以设专科，由学部另行筹议开设。"[13]9中医是根基，讲求实用，应该在学堂专门讲授各代名医方药，设附属医局。西医另辟蹊径，亦有益于民生，政府应该聘请各国名医名士，并购买历年有关西医经典著作，专门讲授。"如此分别办理，则学者习中医以存国粹，习西医以辟新机，庶于分途并进之中，各有深造自得之妙。"[13]9在提出分而教之的构想后，徐定超提出具体的实践措施，即"以医局附设之学堂专课中医，以学部另设之学堂专课西医，庶医派不必强同，而学业各收实益，不似一堂两课，反致骛广而荒也"[13]9。他主张以医局学堂专授中医课程，以学部专设学堂传授西医课程，通过长期教学使学生专精其一。如此一来，中西医学皆能独立发展，学生也不会因为所学繁芜而致荒废。

2.倡导蒙学堂教育，以中学为根基

科举停废后，清政府通过兴办各类学校推广教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十五日，徐定超上《请饬广设蒙养学堂折》，文中开篇即提出应该普及教育："……为修学务早，教育必期普及。"[13]11其后，徐定超指出应该广设蒙养学堂，以稳固根基，然后依次传授西学[13]11。徐定超作为儒家伦理浸染下的封建官吏，难以摆脱旧学的束缚，在思想深处，其始终认为教育应以中学为根基。而蒙学堂作为教育的起始阶段，对个人的价值趋向影响甚大，于其中传输中学就显得尤为重要。

徐定超在强调蒙学堂的重要性之后，指出如今全社会倡言学习，但在偏僻之处，虽然有学堂设立，但却缺少学生。[13]11紧接着，徐定超提出了这种情形产生的原因："科目未废以前，家塾党庠，时闻弦诵，良以课程首重六经，旁至子史，父兄多所素习，子弟自可遵循。今则科学盛行，旧学渐坠，谓语言必须移译，而经传几等赘瘤……"[13]12即科举制度废除以前，不管是家塾还是乡学，传授课程都以六经为重，其次是诸子百家和史集诸书，中学赖此而传承。而如今西学传入，中学渐趋衰落，所学之篇目皆仰翻译西文，中国传统文化几成多余。

徐定超还进一步指出："设学初意，中西并重，而承办学务者大都急于求新，疏于崇古。袭泰西之薄技，则诧为神奇；擅汉宋之兼长，或讥为迂远。"[13]12徐定超主张办学应该中西并重，这要求学校在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兼采中西之长，但办学者大都操之过急，只顾效法西方，而将中学忽略。甚至，有时人将西学视为先进，而将中学视为落后，中西学作为一对共同体，被时人所标签化。

针对中学被忽略的情况，徐定超提出："不知木之根不厚，则其植不蕃；水之源不澄，则其流必浊。自今日言之，学固急期于致用，然未有本源不裕，而可遽得小用小效、大用大效之材者也……初基不慎，造就良难。"[13]12徐定超将中学比作"木之根"与"水之源"，而将西学比作"木之植"及"水之流"，中学的基础性作用由此而得到体现。

最后，徐定超针对此种状况提出解决方法："惟今天下多设蒙养学堂，大县百余处，小县数十处……延聘本地立品而有学行者为之师，但使改良教术，不必兼习西文。"[13]12但是，此种办法与学部章程相违背，徐定超在奏折中解释道："虽与学部奏定小学章程不符，然官立之学堂，欲其风向而无异，宜定其格以示整齐；民立之学堂，欲其费轻而易举，宜宽其途以宏造就。二者并行不悖，皆以劝学，而臣之所言，有以辅学部之所未及者也。拟课经书、历史以外，兼择先哲嘉言懿行，编为教科书，使之先入为主；十五岁以后，然后谘送中学，兼习泰西各种科学；科学既通，始入大学，专讲政治、法律等书。"[13]12

徐定超认为蒙养学堂属于民立学堂，其不必要与官立学堂保持一致，清政府应允许其多样化发展，以开教育之途。徐定超建议蒙学堂时期以中学为学生奠定基础，进入中学以后则兼授中西，大学之后则主讲部分专门学科。徐定超的这种建议不仅体现了他对幼儿教育的关注，也揭示着其以中为宗，中西融合的教育观。

3.注重华侨教育，重用侨民

维新之后，西学大量涌入，社会逐渐形成崇尚西学之风。在这种环境下，徐定超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倍感忧虑，因此他主张以中学为学生奠定基础。同时，徐定超认为身处国外的华侨也应熟知中国传统文化。他指出："华侨在外洋者或数十年，或二三

世，其子弟悉皆外洋文字语言，为中国之民，鲜祖国之谊，奸民煽诱，易为摇惑。”侨民世居国外，袭用外文，如若不了解中国文化，极易为人所煽动，做出妨害国家社会之事。因此，徐定超主张广设侨民学堂，以便在侨民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宜饬学部派委教员，多设蒙塾，教以国文，晓以国粹，其毕业后文理通顺者选入内地肄业，一体奖以出身，则侨民胥知自爱，既可以广我殖民，自不致为渊驱鱼”[13]12。徐定超在提倡开设学堂，推广国粹的同时，还主张对侨民学生进行考核，并根据结果选入内地予以任用，以此来团结侨民。

三、结 语

徐定超作为旧时代下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中学为宗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其教育观念。维新运动之后，知识阶层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加深，但其仍未摆脱“中体西用”论和“西学中源”说的窠臼，徐定超的教育观念亦是如此，在其观念中中学依旧占据着核心位置。但总体而言，相较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徐定超在这一时期的教育观念是比较先进的，其中一些教育主张更是自成一格。如徐定超主张广设侨民学堂，加强侨民的传统文化教育。这一主张不仅提升了侨民的文化归属感，而且有利于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温州作为侨民之乡，旅居在外的华侨众多，徐定超加强华侨教育的主张对我们温州今天的华侨工作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魏源.海国图志：第76卷[M].长沙：岳麓书社，1998：1866.
[2] 贾小叶.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J].史学月刊，2007(10).
[3]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8：172.
[4]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1.
[6] 王韬.弢园老民自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72.
[7]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汤志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107.
[9] 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J].历史研究，1994(1)：137.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6.
[1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15.
[12] 徐定超.徐定超集：下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392.
[13] 徐定超.徐定超集：上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14] 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33.
[15] 刘绍宽.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上册[M].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5：265.

[责任编辑：陈 凯]